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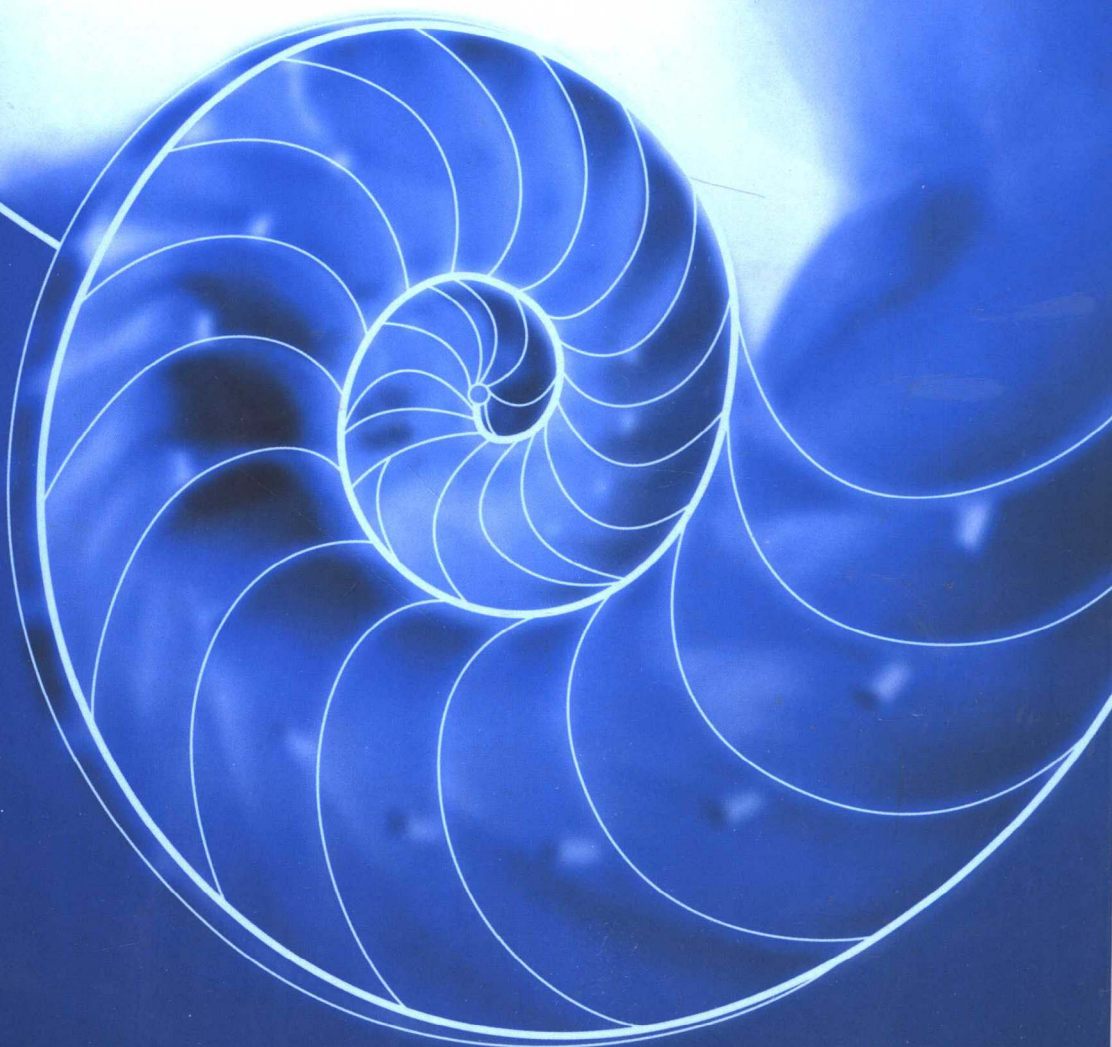
CONG JIANJIN DAO TUBIAN

ZHONGGUO GAIGEKAIFANG YILAI HUOBİ HE XINYONG ZHOUQI KAOCHA

从渐进到突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和信用周期考察

于学军◎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ONG JIANJIN DAO TUBIAN
ZHONGGUO GAIGEKAIFANG YILAI HUOBİ HE XINYONG ZHOUQI KAOCHA

从渐进到突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和信用周期考察

于学军◎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渐进到突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和信用周期考察/于学军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0
ISBN 978 - 7 - 5004 - 6442 - 6

I. 从… II. 于… III. ①货币—经济周期分析—中国
②信用—经济周期分析—中国 IV. F822 F83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3221 号

责任编辑 冯 斌
责任校对 刘 娟
封面设计 部落艺族
版式设计 郑以京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君旺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6.75 插 页 2

字 数 350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这本来是一本博士论文，2000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不久便赶上了好运气，2001 年被评为深圳市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三等奖。虽然是个很小的奖项，但我却发自内心地高兴，因为是平生第一次得到这样的鼓励。

由于工作和学习的关系，我专注于对货币及其规律性的研究，至今回首已十载有八。这确实是一个迷人的研究领域，对国家宏观经济的分析和判断、进而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尤为重要。研究中最重要的心得，是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所有问题，如市场供求、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贸易、财政收支状况、物价波动，等等，在货币和信用周期波动中均会留下印迹，只要细心，均可发现蛛丝马迹。因此有时我感到对货币信用周期波动的研究，就像医生看病把脉或者验血，一切病情均可从中或发现或分析或判断；再往大处说，甚至有点像人类正在进行的关于人类自身科学研究的伟大工程，即解读人类生命密码的所谓生命工程。比如，对 2003 年之后中国出现的经济过热增长问题，大部分机构及专家学者均把它归结为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膨胀使然，背后则是由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及房地产开发商推波助澜所致，因此，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即成为解决经济过热增长的关键环节，等等。但从货币信用的角度来分析，我却发现固定资产投资膨胀并不是本轮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一推动力，而其背后是由进出口贸易剧增及巨额顺差推动的；巨额顺差意味着巨额外资的流入，因而形成巨大的社会需求，并推动固定资产投资膨胀及形成资产泡沫。有数据为证：

2003—2006 年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每年均以超 25% 的速度高增长的同时，外贸出口及顺差则以更高的速度增长，两者总保持一个较大落差，并且如影随形。因此，我做出一个大胆判断：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是由净出口（即顺差）拉动的，净出口是第一位的，固定资产投资是第二位的。所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膨胀的关键在于控制净出口及其增长，何时净出口降下来了，固定资产投资自然回落。而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那么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膨胀即难上加难。但过去因为我们的分析没有找到真正的成因，甚至把问题归结到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头上，所以造成宏观调控政策效果不佳、固定资产投资压而不降的局面。可以做一个比喻：净出口巨额增加的原因是人民币汇率估值过低，而结果是外汇储备巨额增加——这使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以外汇做抵押物，成为我国货币信用扩张的基础，即人民币背后出现了事实上的美元化倾向。这本来是相当于血液中出现的问题，即患了高血压或糖尿病，而我们却只看到了固定资产投资膨胀这个表面现象，当做感冒发烧来治疗，其结果自然是难以对症下药，疗效不明显。此外，货币也是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尤其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其作用更为敏感、有效。一般来说，社会总需求膨胀往往是由货币信用膨胀造成的，没有货币信贷的事前膨胀，就不会有社会总需求的随后膨胀。因此，事先控制好货币信用膨胀，即可较好地管理社会总需求。但这当中确实需要深入地研究和把握，并有高超的本领和技艺来完成。

26 年来，由于我国正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转轨过程中，因此研究货币和信用周期问题也像研究其他领域一样，制度变迁成为一个重要因素。考察中，我们十分关注这一点，因此从书中也可以看出制度变迁的重要作用。随着制度变迁的不断转化和深入，货币和信用周期的波动及成因变化也进展神速。短短 26 年中，我们不仅经历了早期的“财政赤字型通货膨胀”，而且走过了“信贷扩张型通货膨胀”；不仅遭受过通货紧缩的煎熬，而且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流动性过剩；不仅国内的金融市场化进程尚未完成，而且又要突然面对全

面开放的国际化浪潮……变化越来越快，越来越复杂，真令人有些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感。单就 2003 年之后出现的所谓流动性过剩及资产泡沫来说，显然是由于国际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并造成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大量投放所致；而这个问题的出现，显然又与我国于 1994 年确立的结售汇制及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安排有关。但就是同一种制度安排，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面临的却是人民币贬值压力。何以在短短几年中又转变为升值压力？并且，升值预期越来越强烈，导致我国外汇储备迅猛增加。同时，过去我国是一个长期外汇短缺的国家，为何不经意间又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呢？而且，因这种变化是在 2003 年以后迅速出现的，常使我们因“加速度”而感到眩晕，甚至至今仍有些茫然不知所措……综上，本书再次出版时我特意取了一个新名：《从渐进到突变》，即是试图把这种变化和感觉反映出来。

本书除了新时段部分是新写之外，主要是对原书的一次完整修订，因此也可以说是一个“修订本”。在动笔前，我本想在原书基础上写得更加轻松一点，好让读者省时省力。但在实际完成过程中，却发现很难，因为这种体裁、内容过于专业，因而想写得通俗易懂并不容易。最后，只能尽量保持原貌了。但这样做客观上也带来一个好处，即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学术成就。

全书共分十章，除了第一章“导论”和第十章“总结”之外，其他章节均是按时间顺序来写。因而，对本书的阅读，如果是专业人士并对相关内容较为熟悉，可以从头到尾按顺序来读，并且可以前后比较、反复思考；如果是普通读者并对相关知识较为陌生，则可以跳过第一章从第二章读起，最后再回过头来读第一章和第十章，这样容易理解书中的相关内容及顺序安排，读起来也简单一点。不过总体来看，由于本书是一本专业著作，因而对一般读者确属不易，除了需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之外，还要付出相当的耐心。但只要您真正读进去，相信“不枉此行”，它一定会给您带来应有的收获，并分享作者研究的艰辛与快乐。



作者简介

1958年10月出生於呼和浩特市。1982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獲經濟學學士學位；2000年畢業於西安交通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曾供職於內蒙古自治區計委、區黨委；1990年初調中國人民銀行深圳經濟特區分行（1999年後改為中國人民銀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工作，歷任調查統計處處長、辦公室主任、副行長等職；2003年後任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深圳監管局長。

自幼喜歡讀書和提問，發表論文、調研報告120余篇，出版《中國經濟改革二十年貨幣和信用周期考察》（2000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2001年被评为深圳市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三等奖）和《金融实践中的理论思考——特区、创新、借鉴、形势》（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

目 录

前言	(1)
1.0 导论	(1)
1.1 制度变迁与通货膨胀	(1)
1.2 经济周期与货币信用周期	(7)
1.3 理论指导与研究方法	(12)
1.4 为何从改革开放起步	(16)
1.5 结构体系与主要观点	(17)
2.0 旧制度的延续：改革后第一次通货膨胀的发生	(31)
2.1 1980 年通货膨胀是如何发生的	(33)
2.2 财政赤字引发的通货膨胀	(36)
2.3 财政赤字：旧制度条件下发生通货膨胀的显著特征	(39)
2.4 本章提示	(42)
3.0 制度变迁：不同种类的通货膨胀	(44)
3.1 通货膨胀的两种类型	(44)
3.2 制度性缺损：1984 年投资、消费、信贷膨胀的成因	(48)
3.3 1984 年“三大膨胀”的情况及后果	(50)
3.4 本章提示	(53)

4.0	制度完善中的政策失误	(54)
4.1	1985 年开始的紧缩政策到 1986 年就放弃	(54)
4.2	经济增长约束与“软着陆”的提出	(56)
4.3	中央银行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59)
4.4	本章提示	(64)
5.0	1988 年强烈通货膨胀的发生	(66)
5.1	强烈通货膨胀为何在 1988 年爆发	(67)
5.2	货币供应量适度增长：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	(70)
5.3	经济的货币化问题	(72)
5.4	“治理、整顿”政策的实施	(81)
5.5	本章提示	(83)
6.0	制度性复制：1993 年为何重演历史	(85)
6.1	“时滞”问题	(85)
6.2	1993 年通货膨胀的发生	(89)
6.3	发展中的新问题：非银行金融机构与资金拆借市场	(97)
6.4	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的管理和运用	(103)
6.5	制度性弊端：中央银行年初计划从未实现	(108)
6.6	本章提示	(111)
7.0	制度性变革：实现经济“软着陆”	(112)
7.1	整顿金融秩序的开始及效果	(112)
7.2	1994 年金融体制的重大改革	(115)
7.3	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	(118)
7.4	外汇占款与再贷款对经济的不同影响	(121)
7.5	财政赤字弥补方式的改变	(126)
7.6	“软着陆”的成功实现	(130)

7.7	实现“软着陆”的经验总结	(142)
7.8	本章提示	(145)
8.0	政策滞后：通货紧缩的形成	(146)
8.1	1998 年面临的经济形势及政策效用分析	(146)
8.2	通货紧缩的形成	(161)
8.3	货币政策操作力度加大	(175)
8.4	外汇存贷款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182)
8.5	本章提示	(188)
9.0	判断误区：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并存	(189)
9.1	2003 年凸现经济过热现象	(190)
9.2	净出口：本轮经济过热增长的原动力	(197)
9.3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缺陷	(206)
9.4	外汇储备陡增与全球美元泛滥并非巧合	(212)
9.5	政治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	(216)
9.6	资产泡沫型通货膨胀	(220)
9.7	本章提示	(223)
10.0	26 年货币和信用周期考察的概括性总结	(225)
10.1	制度变迁：26 年货币和信用周期考察的描述	(225)
10.2	货币供应量管理：货币和信用周期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232)
10.3	中央银行独立性：一个需要解决的一般性问题	(233)
10.4	汇率市场化改革：货币和信用周期波动复杂化	(235)
10.5	通货紧缩：货币和信用周期波动的另一种现象	(238)
10.6	财政赤字：并非引起货币和信用周期波动的根源	(239)
10.7	金融体制改革：实现经济“软着陆”的制度性原因	(241)
10.8	金融国际化：货币信用面临的新挑战	(243)

10.9 基础货币管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245)

附 岁月深处的记忆——深切缅怀导师江其务 (247)

后记 (257)

1

导 论

自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在前 20 年共发生了四次明显的通货膨胀，1998 年以后又遭遇史无前例的通货紧缩现象，而正是在“反通缩”政策不断出台之中，2003 年之后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过剩”现象，并至今仍未能摆脱这种旋涡。这种货币、经济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彼此之间有无内在联系？如何才能克服？等等，显然这是一个充满诱惑的研究领域，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程恰恰又提供了这样一个极具分析和考察价值的难得背景 and 良好素材。

1.1 制度变迁与通货膨胀

对于货币和信用周期的研究来说，最著名和最具代表性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可以说，货币大师弗里德曼的全部研究就是围绕着“货币和信用周期”来展开的，他的重要著作《美国货币史 1868—1960》，顾名思义，即是一部写货币的历史。他提出的著名命题及重要结论，都是从对美国货币历史的实证考察中得出的。

借用一句未置可否的行话，如果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那么货币在整个经济领域无所不在，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围绕着货币来展开的，从货币来到货币去，而且货币问题最为复杂、变化莫测并难以

捉摸，应该是“核心中的核心”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 26 年的历程，经过了许多风雨和波折，其中既有宏观经济失控的教训，也面临过通货紧缩和流动性过剩的难题，使我们感到非常有必要对我国的货币及其波动情况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从中揭示出我国产生经济周期波动及通货变化方面的规律、生成机理，等等。货币研究可以为宏观经济分析及政策制定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26 年，对货币和信用周期展开考察和研究，最具共性的东西是什么？或者从哪个角度、线索来考察？这是我们首先碰到并要解决的问题。经过深入思考，我们得到这样一个认识：26 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最突出的特征恐怕即是改革本身；改革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破旧立新”的过程，正是要打破旧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种不合理制度，而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要求创立新的制度。因此，研究中我们选择了“制度变迁”这一主线，并成为研究的重要思路，也正好与 26 年来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

围绕这一主线进行考察，我们首先发现我国几次通货膨胀的发生确与当时的制度安排有关，而此后随即形成的通货紧缩、流动性过剩等现象，也与我们的相关制度不能做出择机改革的反应相关。在此，我们首先将我国历次发生的通货膨胀划分为三种类型和四个阶段。

建国后至 1983 年之前为第一阶段。这个时期我国共发生过三次明显的通货膨胀，第一次是 1960—1962 年，峰值为 16.2%（物价指数涨幅）；第二次是 1973—1977 年，峰值为 2%；第三次是 1979—1981 年，峰值为 6%。这三个通货膨胀发生时期，恰好是我国历史上仅有的三个连续发生财政赤字的年代，而且三次通货膨胀的高峰期往往是连续发生财政赤字的最后二三年。这是因为财政赤字有一个累加过程，在当时历史条件局限下，逐年积累的结果最终只能由增加货币发行的办法来解决，所以导致社会总需求膨胀并最终体现在物价上涨中。因此，这一阶段我国发生通货膨胀与发生财政赤字紧密联系，基本上是同步的，而与经济周期波动关系却不大；因而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周期波动往往由政治运动冲击造成，而与货币供应

波动关系不大。其成因在于：那个时期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社会生活、经济活动十分贫乏，国家财政包容了社会经济的所有领域，实行全国范围的统收统支；其中也包容了银行，银行不过是财政系统辖中的一个会计出纳角色（事实上当时全社会只有人民银行一家银行包办了所有极其简单的结算、信贷业务）。这种体制下，即使银行想扩大货币信用投放也往往无从下手，只能是由“大一统”的财政赤字进行扩张，所以，财政赤字便成了货币信贷投放的重要闸门。结果使人们（甚至是专家学者）产生了一个错觉，以为那时中国的基础货币投放有两个渠道，一个是“财政口”，即通过财政部门投放基础货币；另一个是“银行口”，即通过银行信贷投放基础货币。其实这是误会：基础货币的投放只能是出自中央银行一个闸门，这是货币供应的真正源泉，而其他任何渠道的投放只能是第二位，甚至是第三位的。一些学者之所以把财政看成是货币投放的一道闸门，是因为没有看到这道门之后还有一道门，而那道门正是中央银行本身。

综上，我们把我国解放后直至 1983 年在 30 多年中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稍加归纳和总结，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把这一阶段的通货膨胀类型概括为“财政赤字型通货膨胀”。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物价水平是极其平稳的，那是因为短缺经济条件下实行严格的物价管制所致，因此 1973—1977 年通胀虽然物价涨幅很低，但在那个年代也算明显了，并且存在一个隐性通胀问题。

1984—1996 年为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后，我国再度发生通货膨胀出现在 1984 年，这次通货膨胀的情形及成因与以前历次通货膨胀相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今非昔比，大相径庭。首先，1984 年通货膨胀的发生，显然不是由财政赤字引起的，因为 1984—1985 年恰好是我国财政收支状况最好的年代，其中 1985 年是唯一出现财政收支结余的一年。1984 年通货膨胀的发生是由银行信贷资金管理失控造成的，事实上这一年发生了解放以后从未有过的所谓信贷、投资和消费基金的“三大膨胀”（当时用语）。1984 年之前的 30 多年中，我国曾多次发生投资膨胀和消费基金膨胀（主要是投资膨胀），但从未发生过信贷基金

（当时用语）同时膨胀的情况。显然，“三大膨胀”中最例外、最独特、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信用膨胀，它反映出此次通货膨胀与以前历次通货膨胀的区别之处。这一点在我们以后的分析中应特别注意。

1984年以后通货膨胀进入第二阶段，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时期，许多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及重要的历史事件均发生在这个阶段。1984年之所以成为我国划分通货膨胀阶段的一个重要起点和分界线，关键因素是这一年我国进行了一些重要的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中央银行体制的设立。原来的中国人民银行既承担发行和管理货币的中央银行职能，又从事一般性工商信贷业务，1983年由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一个中国工商银行，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体制改革使各家银行（已成立了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开始有了利益激励机制，并且各地区的地方主义倾向和地方利益动机也十分强烈，再加上当时中央银行体制改革在基础货币管理上存在的较大漏洞——这几个因素结合起来就造成各家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在1984年四季度突击放贷，从而引发了严重的信用膨胀。所以，1984年通货膨胀的成因，主要是由于银行无节制地大量放贷造成，从而便以这次发生的通货膨胀为标志，开始了我国通货膨胀发生的新阶段、新类型。

第二阶段1984—1996年大约经历十余载，其间我国共发生了三次大的通货膨胀，1984年为第一次，1988年为第二次，1993年为第三次。尽管每一次发生通胀的具体情况、程度及制度原因不尽相同，但总的来看却均与银行的信用膨胀结下了不解之缘，每一次通胀都由信用膨胀伴随而行，都离不开银行信贷资金的大量投放。而与财政的联系，尽管在这个时期发生的财政赤字仍然沿用中央银行透支的办法来弥补，但融资数额并不大（虽然分析中也可以看做是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并引发通货膨胀的一个诱因），绝对不是主要原因。据此，如果我们对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类型加以总结和描述的话，那么最突出、最大的特征便是信贷资金在通货膨胀发生前的过量投放，所以我们可以用“信贷扩张型通货膨胀”来概括第二阶段的通胀类型。世事沧桑，从“财政赤字型通货膨

胀”到“信贷扩张型通货膨胀”，反映了制度变迁的巨大跨度。

第三个阶段以 1996 年划分，大约至 2003 年。1994 年我国对金融体制进行过一次重大改革，并把这些改革成果直接吸收到《中国人民银行法》中作为法律条文确定下来。其中对中央银行体制建设及货币控制来说，最重要的有几点：（1）停止中央银行用直接融资的办法弥补政府财政赤字；（2）中央银行停止并收回各类专项贷款，中央银行不再向非金融机构直接发放贷款；（3）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把过去工、农、中、建四家专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从机构的设置上彻底分开（专业银行改变成为商业银行）；（4）中央银行财务费用的会计管理体制由过去的利润留成制改为收支两条线的预算制。1998 年以后中央银行又进行了一些体制的完善，包括：（1）取消信贷规模管理办法，并代之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2）合并存款准备金与备付金账户，并将存款准备金率先后降低到 8% 和 6%。以上各项体制改革，均硬化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信贷的管理，为我国以后发生通货膨胀设置了较为严格的屏障。这是我国 1994 年以后成功实行三年宏观调控并实现“软着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性原因。

1994 年及以后的金融体制改革，既封堵了财政赤字通过向中央银行透支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的渠道，又严格了由银行体系过多信贷投放而形成通货膨胀的体制限制。因此，1994 年以后的第三个阶段，我国既未发生“财政赤字型通货膨胀”，也未发生“信贷扩张型通货膨胀”，我国货币和信用周期显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第一是由于中央银行制度性变革，堵住了政府向中央银行直接透支的渠道，也杜绝了中央银行直接向非金融部门融资的渠道，从而保障了中央政府及中央银行有效管理货币信用职能的发挥。再加上中央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与管理在认识、经验、专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三年宏观调控掌控得法、松紧适度，终于实现了一次真正的“软着陆”。第二在我国宏观调控取得巨大成功之际，1997 年却在不经意间发生了波及全球的亚洲金融危机，先后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相继巨幅贬值，并直接冲击中国，给人民币带来巨大的

贬值压力，遂使中国从 1998 年以后经历了一次通货紧缩的过程，这在我国近代历史上极为罕见，至今都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之谜。

2003 年以后进入第四个阶段，至今仍持续着这个过程，最大特征即是“流动性过剩”。所谓“流动性过剩”，首先是指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太多了，苦于找不到好的放贷项目；其次也可以看做是社会上各个领域的资金忽然多起来了，到处都感到钱好找，或融资不难。中国本来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约束条件，所以我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即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吸引各个领域的外资进入中国，怎么现在变得钱多起来了？这么多的钱是哪儿来的？怎么回事？现在经常可以听到人们此类不解的疑问。这显然与我国这些年来连年累加的巨额贸易顺差有关，与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巨额增加有关。外汇储备转化为人民币资金投入到市场，遂形成人民币资金在国内的泛滥。这与在此之前我国发生的历次通货膨胀不同，那时的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通过各种渠道“自发”地投放出来的，很少是由收购外汇储备这样一种方式投放的，因此，那时我国发生的通货膨胀都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儿，货币信用的自我膨胀，具有“内生性”特点；而 2003 年之后我国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却主要是通过收购外汇储备形成的，因而，无论自觉与否，实际上我国这时的基础货币投放必然涉及境外或某个第三国，意味着一种“外部性”。

货币泛滥必然带来通货膨胀，难道我国目前的“流动性过剩”就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吗？其实不然，2003 年以后我国事实上发生了明显的通货膨胀，只不过是表现在不同的价格指数上。首先是能源、原材料等价格指数暴涨，有的已翻番；其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2004 年最高月份时已超过 5%。更明显的是房地产等资源类物品的价格指数飞涨，即出现了所谓“资产泡沫化”现象。流动性过剩与资产泡沫是相伴而生的一对孪生姊妹，仿佛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即过多的钱追逐过少的商品，遂造成商品的货币价格上涨。因此，衡量通胀的标识，应该是多种价格指数。但过去，因为人类早期维持生存，衣食住行等日常消费用品